

第二单元 宋元时期

第7课 契丹崛起与北宋建立

内容标准

知道北宋的建立,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特点。

一、教学立意

通过对北宋文人政治形成过程和影响的探知和了解,感悟宋的时代氛围。通过对宋朝政治制度的诠释和分析,培育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的能力。

二、教学目标

知道辽的建立和北宋的建立。知道北宋的基本国策及其影响。通过分析和解读唐“安史之乱”以来的政治顽疾,理解宋代基本国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梳理回顾秦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了解宋代中央集权的加强。

三、教材分析

1. 内容主旨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文官政治。

2. 主旨诠释

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面对半个世纪的武人乱政的局面后,宋太祖赵匡胤完成了新的统一。基于历史教训,宋朝统治者改弦易辙,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实行文官体制,并且优待文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宋代文化繁荣。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国家分裂方面的诸多制度创设,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3. 要点分析

本单元是本册教材的第二单元,主要叙述宋元时期的历史。本课是本单元的第一课,主要勾

勒了北宋王朝的建立及其基本国策,同时简单交代了契丹的建国和南北面官制。文人政治的形成及其影响是本课的核心内容。

第一目“辽朝建立”主要叙述了契丹的兴起和辽实行的“一国两制”。唐代末年,北方的契丹族乘中原王朝连年战乱迅速崛起。契丹建国后,国力不断增强,势力逐步扩展到了长城以南今河北和山西北部的汉族地区。面对不同民族,辽朝创造性地采取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的政策。第二目“北宋统一”主要叙述了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以及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扫平各地割据势力,重建统一王朝的过程。第三目“宋朝的基本国策”叙述了宋朝统治者吸取晚唐、五代以来武人干政的历史教训,在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最终形成了文官体制。

四、重点与难点

1. 重点

宋朝的基本国策。

2. 难点

宋代文人政治的影响。

五、教学设计建议

设计一：讲述分析法

导入新课

教师讲述“黄袍加身”的故事,交代北宋的建立。

1. 北宋的统一和北方强邻——辽的建立

(1) 北宋的统一

讲述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和宋太宗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完成统一。请同学观察教材第8课“宋、辽、西夏形势图”,使学生了解北宋政权面临北方强邻——辽的威胁。

(2) 辽的由来

介绍晚唐五代时期契丹的兴起和建国。随后简要交代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可以南北面官制为例进行说明。

2. 宋的创制及其影响

(1) 宋创制的历史背景

指出晚唐五代以来武将用军队颠覆皇权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赵匡胤本人也是凭借兵权登上皇位的。

(2) 宋创制的主要内容

以教师讲解为主。针对中央将领,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确立枢密院主军政、三衙分掌禁军和皇帝总揽兵权体制。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一般由文官担

任。针对地方藩镇,实行内重外轻方针,令各地拣选强壮士兵编入禁军,地方留老弱者充任厢兵和乡兵。采取更戍法,无论京城还是外地驻军,都必须轮流变换驻地以防止将领分立割据、拥兵对抗朝廷。建立文官政府:宋初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防范武将专权,也不以开国功臣及其后代组成统治集团,而是通过科举制度来大量提拔文人担任官职。中央政府重要官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正副枢密使以及地方要员,大都由文人担任,形成一个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府。为了制衡各方,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

(3) 影响:文人政治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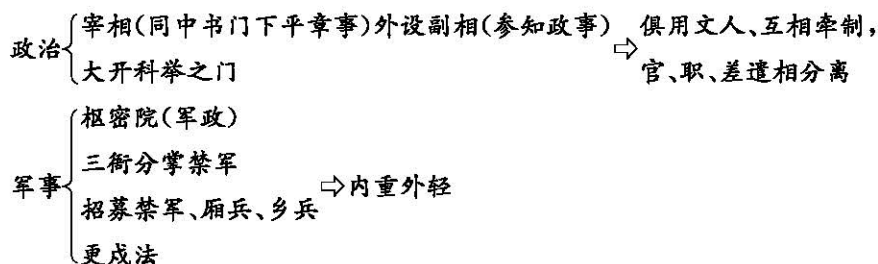
讲清科举成为宋朝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政府完善了科举的制度和规则,增加了录取名额。解读史料“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为之”(范镇《东斋记事》卷一),使学生理解宋朝政府对士人的尊重与优待。分析优待士人、大开科举之门的影响,让学生明白文人政治一方面巩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导致官僚机构臃肿、官员人数膨胀的“冗官”局面

小结

宋代创新的制度安排,塑造了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文人政治。

附: 板书设计

第7课 契丹崛起与北宋建立



设计二: 问题教学法

本教法适合基础较好的学生。组织学生阅读教材,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

- (1) 辽建立的时间?
- (2) 辽的主要政治制度?
- (3) 北宋的建立时间?
- (4) 北宋的基本国策是什么?
- (5) 北宋基本国策的影响是什么?

六、习题分析

1. 课外学史

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主要特点是以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善骑射等。教师引导学生主要从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有效巩固统治和吸收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思考。

2. 思考与讨论

兵将分离会使军队战斗力较弱。北宋在与辽和后来兴起的西夏的战争中,基本处于劣势地位。官员数量急速膨胀对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从北宋中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受困于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所以,北宋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教师注意组织学生讨论缓解上面这些问题的方法时,重在启发学生思考,不设任何预设答案。

七、课文注释

1. 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流传着一则古老的传说:在不能确指的年代,一英俊少年骑白马自潢河(西拉木伦河)而来,一位美丽的少女乘青牛自土河(老哈河)而来,两人在两河交汇的木叶山上相遇,结为夫妻,生育八子,后来建成契丹八个部落。唐代中期以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突厥、回鹘相继衰亡,唐朝中央政权因藩镇割据也没有实力控制周边地区,契丹族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耶律阿保机(872—926年),汉名耶律亿,出身于迭刺部的显贵家族,早在901年,就被推举为遥辇氏族联盟的夷离堇(军事首长),主管联盟的军事。906年,阿保机以实力和才略被选为可汗。907年正月,阿保机以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即可汗之位。其后,他听从汉人谋士的建议,决心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君主制,向“三年选汗,以次相代”的旧制度发起挑战。915年,他派人遍告诸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同食。你们只知食盐之利,不知答谢主人,行吗?你们应该来犒劳我!之后,诸部以牛酒犒于盐池,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最终扫清了建国的障碍。916年,耶律阿保机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改称辽;984年,辽圣宗复称契丹;1066年,辽道宗又改称辽),建元神册,自称天皇帝,此即辽太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

建国之初,辽太祖首先在潢河以北(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营建皇都,后辽太宗又对其进行数次扩建,改称上京。上京的营建,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空前创举,也表明契丹民族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上的积极态度。其次,辽太祖命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创制契丹大字(其后,太祖之弟迭刺又以回鹘文字创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用结束了契丹族“刻木为契”的历史,加速了其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从此,辽作为契丹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雄踞北方。

2. 鎏金银鸡冠壶

这件鎏金银鸡冠壶于197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洞后村窖藏出土,高26厘米,底长21厘米,宽16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壶上窄下宽,壶口为椭圆形,上有盖;壶表面镌刻缠枝卷叶纹,两侧装饰双重棱形开光纹,壶身中心镌一卧鹿。壶造型为典型的契丹族皮囊壶式样,但装饰技法和纹样内容则受唐代中晚期内地工艺的影响。

3. 燕云十六州

后晋高祖石敬瑭,原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他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借助契丹的兵力,消灭后唐,登上帝位。其后,为答谢耶律德光的支持,将幽、蓟等十六州割让给耶律德光。石敬瑭割让的这十六州,后来被称为燕云十六州。十六州的范围大约以今北京和山西大同为中心,东至河北遵化,北至长城,西界山西神池,南至天津、河北河间、保定以及山西繁县、宁武一线以北地区。

上文所述的十六州,并无“燕州”之名,《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亦无“燕云十六州”之称,只统称石敬瑭割让之地为“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燕云”之称,最早在北宋末年出现,不过,当时只是泛指北方的失地,并非实指石敬瑭割让的十六州。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朝设立“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燕”“云”连称才有确指的地域。不过,当时的“燕”“云”二府所管辖的州,比石敬瑭割让的十六州的范围还要大些。直到元朝时编撰的《宋史·地理志》里,才第一次出现“燕云十六州”的称呼,并把“燕云”和石敬瑭割让的“十六州”合在一起称呼。其后,历代史家遂沿袭之,把石敬瑭割让的“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即幽蓟十六州称为“燕云十六州”。

4.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

926年,耶律阿保机病逝,继位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继续扩展领土,取得幽蓟十六州后,其势力已延伸到今河北和山西北部的汉族地区。其版图最盛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高碑店市东白沟河),幅员万里”。中世纪欧洲人多称中国为Cathay,即从“契丹”的发音演变而来。当时,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主要从事农业,契丹人、奚人等主要从事畜牧业。对于作为辽朝统治阶级的契丹贵族而言,在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如何在民族关系上协调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关系到辽朝能否长期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形成南北对峙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南北面官制”即是契丹统治阶级的一大创造,据《辽史》记载:“(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契丹旧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辽朝政治制度的主要创举就是南北面官制。“南北面”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有拜日之俗,故皇帝宫帐必坐西面东,而且辽俗尚左,故契丹官衙都在皇帝宫帐之左,即在北面,汉人官衙则位于其右,即在南面,此即南北面官制名称的由来。但需要注意的是,北面官制中也有分称南北的,例如南枢密院和北枢密院,这里的南北枢密院与南北面官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北面官制也称“国制”,主要有:大于越府,设于越,位居百官之上,无职掌,为契丹最尊之官;北、南枢密院,为辽朝最高行政机关,各设枢密使为长官,分掌契丹的军政和民政;北、南宰相府,分别以后族与皇族为北府宰相与南府宰相,佐理军国大政;北、南大王院,设北、南院大王,分掌契丹各部族的军民之政;北、南宣徽院,各设宣徽使为长官,职掌略同工部;大惕隐司,长官为惕隐,

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

南面官制也称“汉制”，主要有：枢密院，以枢密使为长官，掌汉人兵马之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侍郎及六部，主管赋税财政；政事省，后改名中书省，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政务；门下省，设侍中、常侍，为有名无实的机构。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也贯彻于地方统治中。立朝时，皇帝与南面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面契丹臣僚则着契丹服饰，“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的南面官制大体以唐制为主，后又兼用宋制而略加变通。担任南面官的也有不少契丹人，他们也称汉官，也着汉服。而汉人出任北面官的则凤毛麟角。南北面官制度的施行，充分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治理多民族国家的智慧和创造性。

辽朝不仅官分南北，而且律分番汉。一般情况下，番律施行于契丹和其他民族，汉律适用于汉人和原渤海人。凡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刑事案件，统一用汉律断案。辽初汉律沿袭唐律，中期以后则用宋律，有诏为证：“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不得造次举止。”“不得造次”云云，表明辽朝皇帝对汉律独立性的高度重视。

5. 陈桥兵变与陈桥驿遗址

五代仅 53 年，先后竟出了 14 位君主，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意思是说，中央政权不强大振作，权力反而下移，下面的权力凌驾于上，上面的权力却衰替，于是战祸动乱接踵而至，既然藩镇可以蔑视朝廷的存在，军士也就效法着胁迫其主帅闹事，历来犯上作乱，没有像五代那样至于极点的。五代后周末年，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殿前司系统当时是禁军的精锐所在。959 年，后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当时在京城禁军将领，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后周面临着“主少国疑”的局面。十一月，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州）节度使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七年（960 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派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是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大军将出，都下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 40 余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的意图报告给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和赵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俩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匡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赵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赵匡胤帐前，赵匡义与赵普入内，赵匡胤才做乍醒欠伸状，黄袍已加其身。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的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事项，率大军返回开封。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于是，当日就

行禅代礼,正愁没有禅让的文告时,原后周翰林承旨陶穀就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遂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陈桥驿是五代和宋的驿站,因驿北有陈桥而得名,是古代开封向正北行进的第一个驿站。因宋太祖在此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以陈桥驿为宋代发祥地,在这里建立名叫显烈观的道观以为纪念。后黄河改道,将陈桥驿遗址隔断在黄河以北。该遗址今在封丘县陈桥镇,桥已无存,院内有古槐一株,高5.4米,枝叶繁茂,号称“系马槐”,相传赵匡胤曾在此拴马,树前有系马碑,右有“宋太祖黄袍加身处”碑,另有明清碑刻多处。

6. 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记载了赵普与宋太祖的一段对话,这可被视为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缘起以及所遵循的方针。赵普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涑水记闻》和其他史料所载“削夺”都作“稍夺”,根据学者研究,“稍”当是“削”的形误。)其大意是说,唐朝末年以来,天下战争不断,国家不安定,其中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藩镇势力太大,君权削弱,而臣下实力却大大加强。今天倘若要根治这些积弊,也没有其他奇计巧谋,只要削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源和粮食,收回他们手中的精兵,天下自然而然就安定了。

在收行政权、财权和兵权三大纲领的指导下,宋太祖除了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禁军宿将的典兵权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为解决晚唐以来藩镇权力过大的问题,宋太祖首先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也称“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理。他在平定南平等割据势力后,就派文官出任这种州郡的“知州”和“知县”,直接向中央奏事,不再听命于节度使,后来又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其次,规定各地每年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应付日常开支的经费外,其余钱粮都必须运送中央,不得截留,还在地方路一级设立转运使专管地方财赋。再次,通过各种方式,剥夺节度使和地方的兵权。宋太祖命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的人都送到中央补入禁军。后来又选择强壮的士兵作为“兵样”,命各地依样选练士兵后送入禁军(后以“木梃”代替“兵样”)。这样就使地方军队再无精兵与中央抗衡。最后,在以上措施发生效应以后,宋太祖再次拿出类似“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干脆剥夺了原任节度使的职权,使它仅成为优礼有功大臣的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在扭转“君弱臣强”方面,宋太祖首先在中央实行民政、军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削夺宰相的权力。他设立枢密院,命其长官——枢密使专掌军政,地位与宰相相当。宰相办公的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又设三司使,把中央最高财政权从宰相所管的户部划归三司。于是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权力大为削弱。宋代以前,宰相与皇帝是坐而论政的,还有茶招待。宋初,后周留用宰相范质坐着奏事,宋太祖借口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他把奏稿送到御座前,等范质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去,此后宰相论事赐坐赐茶的制度也被废除,地位大不如前。

另外,宋太祖还实行军事制度的改革,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1)禁军改由“三衙”分掌。

三衙指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其长官称为“三帅”，分领禁军，互不统属，由皇帝直接任命，只对皇帝负责。(2)领兵权和调兵权分离。三帅只有领兵权，没有调兵权和发兵权；调兵权和发兵权归枢密院，但枢密院不能直接掌握军队。(3)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内外相维”。宋太祖把一半的禁军部署在京师，一半部署在外地，既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对付京城驻军可能出现的内乱。(4)让兵将分离。无论京城还是外地的驻军，都必须经常调动驻地，称“更戍法”。军队将领也经常更换，有战事出兵，将领由皇帝临时任命，兵事结束，兵将各归其所。这样，将领就不能拥兵自重，对抗中央了。

总之，宋太祖在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国家分裂方面是卓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宋代以后，中央王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割据分裂的局面，这与宋太祖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密切相关的。

7. 三衙

三衙为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的合称，也称“三司”。侍卫亲军，为五代后梁所设，后成为朝廷直辖军，后周又设殿前都指挥司，与侍卫司形成“两司”。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原禁军高级军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次长官不再同时并设，甚至缺而不设。宋初，又在侍卫亲军下分设马军司、步军司，以为直属机构，与殿前司合称三衙，成为统领禁军的最高军事机构。三衙的设立约完成于宋真宗时。三衙的长官为都指挥使，简称殿帅、马帅、步帅。三衙互相牵制，改变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的局面。三衙只有统兵权，军队调遣之权则由枢密院执掌，三衙、枢密院又互相制约，兵权最终集于皇帝手中。每有出征，由皇帝临战命帅，所命者往往不是三衙将领。南宋初，三衙已无权掌管全国的军队，三衙的军队，仅为驻守在临安的三支军队。

8. 宋初的兵制改革及其影响

宋初的兵制改革，有效地消除了分裂割据和武人乱政的隐患，但军权分散、内重外轻和兵将分离等方针措施，削弱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禁军、厢兵和乡兵都由政府招募，大量招募士兵造成财政开支的激增，成为宋朝“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令各地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登记造册送至京师，补充禁军缺额。又选拔强悍的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依样募兵。禁军吸纳精强士兵之后，地方军队尽留老弱之兵，藩镇就无力在军事上与中央抗衡，达到内重外轻的形势。

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减少农民的徭役负担，宋朝以募兵的方式，始终维持着数量庞大的军队。以禁军为例，宋太祖时19.3万，太宗时35.8万，真宗时达43.2万，仁宗时达82.6万；地方厢兵的人数最多时达48万。也有人认为，自宋中期开始，包括禁军、厢兵、乡兵在内的军队的数量，一般都达到100万以上。这些全由招募而来的士兵，军费开支十分庞大，是宋代财政开支中的主要项目。宋代官禄虽为优厚，但官员人数不过数万。而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开支的绝大部分。宋人有估计占六七成的，也有估计占八九成的。据北宋蔡襄《论兵十事疏》所记治平元

年(1064年)全国钱、帛、粮、草四项收支与军费开支的具体数字统计,钱一项,军费所占比例为30%;帛一项,军费所占比例为103%;粮一项,军费所占比例为76%;草一项,军费所占比例为85%。此统计仅包括军队官员、士兵的给养,兵器装备的军费还不包括在内。

宋朝招募的士兵,多流民、饥民,官府确立一定的体检标准,体检合格后,便在士兵脸部、手臂或手背等处刺字,以防其逃跑。刺字,在古代本是用来标识奴隶、罪犯身份的一种记号。这种五代时的恶习,宋时仍不能改。将刺字用于士兵身上,说明士兵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甚低,而这反过来,也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9. 宋代官制的官、职、差遣

北宋初年,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宋朝统治者不仅保留了后周的政治机构,还留用了许多后周的官员。为了保证新王朝的正常运行,必须架空旧机构、旧官员,设置新机构、新官员,将官名与职权分开,以“差遣”的名义派遣具体办事的官员。由此形成了北宋官制上官、职、差遣的分离。

宋代上至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一般官员,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品级的高低、相应俸禄的高低,称正官、寄禄官,也简称官。职是授予某些有名望官员的荣衔,如学士、直阁等,通常并不担任相应的馆阁之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衔,称职,也称贴职。差遣则是实际担当的职务,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加有“判”“知”“权”“提举”“提点”之类。官、职、差遣的分离,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宋初的政局,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但也带来了机构重叠、冗官冗禄的弊病。

10. 宋代的解试、省试和殿试

科举考试是宋代主要的官员录用制度,也就是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报考,最后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官员选拔制度。宋代的科举有贡举、武举、制举、词举、童子科等不同的科目。

贡举又称常科,是科举考试中最主要的科目,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和作文的水平。武举是选择武官的科目,主要考察应考者的弓马武艺。制科也称特科,主要用于选拔特殊人才。词科也是为选拔起草诏书人才而特设的科目,主要考察应试者公文写作的能力。童子科是15岁以下少年参加的应试科目。

宋代的贡举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逐层选拔的制度。

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使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一般在秋季举行,故也称“秋试”或“秋赋”。每逢科考之年,在农历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天。解试中格者分甲、乙二等,第一名称“解元”,合格者称“发解进士”“发解举人”。通过考试的举人,由州府、转运使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录取名额)送到礼部,参加次年举行的省试。如果省试失败,下次应举仍需参加解试,以获得再次参加省试的资格。

省试,又称礼部试(因就试于尚书省的礼部而得名)、“春试”(因在春季举行而得名)。宋代科举考试,初为一年一举,也有二年、三年甚至四年一举,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以后,三年一举成

为定制。秋季解试通过的考生,在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城,等待次年春季的省试。省试一般选择在正月或二月、三月开考,考试的各科士子,统称“举人”或“举子”。应试的“举人”到京城后,要写好家状、年龄、籍贯、参加科举次数等,向礼部报到,取得考试资格,由礼部在考前公布考生坐次表。省试由朝廷临时差知贡举四五人主考,连考三天。考试内容,进士科试诗、赋、策、论,其他诸科试帖书、对墨义等。省试的第一名成为“省元”,省试合格者由礼部将其名单奏报朝廷,参加殿试。

殿试也称廷试、御试,是宋代贡举的最高一级考试。唐代武则天时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为殿前试士之始,但不是常制。宋代殿试,起于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此年知贡举李昉徇私录取才智平平的同乡,为落第的举人徐士廉等告发,宋太祖赵匡胤遂在讲武殿出题复试新及第的进士以及落第的举人,其后遂成定制。殿试与省试一样,一般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凡举人经省试合格后,须再经过殿试合格,才能正式取得出身。殿试的内容是诗、赋、论,考试成绩分五等,第一、二等赐及第,第三等赐出身,第四、五等赐同出身,殿试的第一名则称“状元”。

11. 弥封与誊录

弥封,又称“糊名”,是科举考试中防止作弊的一项规定。唐初考试并不糊名,这就为行私作弊大开方便之门。唐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人多不实”,乃采取糊名的方法,但不久又罢之。五代后周糊名也一度施行,但也因权贵反对,终又被废。直到北宋淳化三年(992年)三月,糊名制才再次推行。宋代的糊名就是将试卷卷头考生姓名、籍贯等糊住或贴封,以杜绝舞弊。同时封糊的还有考官初定的等级,故也称“封弥”。

宋代采取糊名制度的同时,也施行誊录之制。所谓誊录,就是由人将考卷重新抄录,使考官不能从字体或暗号上来识别考生,从中作弊。为此,贡院内设誊录院。举人交卷之后,由封印官密封卷头,编成字号,加盖印鉴,送往誊录院。在两名宦官的监督下,由誊录官指挥数百名书吏将试卷抄录成副本,抄录之后,还要由校勘官校对。因此,举人的亲笔试卷称“真卷”,交弥封官保存;誊录卷称“草卷”,交考官评阅。先是殿试采取糊名誊录制,后来省试也采取糊名誊录制。

12. 别头试与锁厅试

别头试,也称“别试”。别头试是科举考试的方式之一,始于唐代,但唐代仅限于礼部试,且未成定制。宋时规定:凡礼部试、乡试、漕试等考官及有关官员的亲戚、子弟、门客参加考试时,须避别,由朝廷另立科场,特派考官单独监考,以防止官员利用职权舞弊。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诏诸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别头试”名源于此。至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命各路都实行别头试。自此,除了殿试之外,各级考试均设别头场或别头院,另行考试。

锁厅试,也称“锁厅”“锁试”,是宋代科举中现任官员参加考试时采用的一种应试方法。宋代规定,现任官员也可以参加考试。考上等的,在原官职上提升两级。优秀的,还可以被破格提升,参加殿试。考下等的,入太学学习,学后再考。如此,官员在科举考试中就占有优势,且容易利用

职权、地位来舞弊谋私。宋代对此防范甚严。现任官员报考,均另设专场,称“锁厅试”。

13. 宋代的冗官冗兵

所谓宋代的冗官,是指宋代官僚机构严重臃肿,官僚人数恶性膨胀。据文献记载,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文武官员总数是 9758 人,内外官总共 17330 余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未委派差遣职事的待安置官员在内。而在 30 多年后的宋仁宗皇祐年间,官员人数便增加一倍,为数 2 万多。宋代冗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宋太祖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后,为了保证权力转移的顺利完成,朝廷采取官职分离、分化事权的办法,在保留旧机构、旧官员的同时,又设置了许多新机构、新官员。于是官僚机构重复,有官无职事的人员越来越多,造成中央的许多机构都闲置。以尚书省各部为例:“吏部闲了,事却归审官院及流内铨;户部闲了,事却归三司;礼部闲了,事归礼院;刑部闲了,事归审刑院;兵部闲了,事归枢密院。”“虽有其官,不举其职”,而“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旧公事”。

其二,唐代科举录取人数较少,考取者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的考核才能择优派官。宋代大开科举之门,取士越来越多。以进士科为例,唐代进士科每年取士 20 至 30 人。宋代进士科取录分三等,每年取士达 300 至 400 人,且一经考取,即可做官。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大大增加。

其三,磨勘、恩荫制度加剧了官员人数的增加。磨勘是一种叙迁官吏的制度。磨勘之制始于唐代,初由州、府等长官负责考核属下官员的功过才能,分等次评定,并经吏部等复核,决定升降。至宋真宗时,规定文武官员任职满三年,给予磨勘迁秩。仁宗时又规定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宋代磨勘,流于形式,一般官员只要无大差错,每三年都可以迁转一官,被罢黜者甚少。宋代又施行恩荫制度,官员的子孙可以通过恩荫而得官,又称为“任子”。在宋代,级别较高的官员,每年可恩荫一子为官,级别较低的官员,每三年可授以一子官职。而且,宋代恩荫的机会特多。如朝廷南郊大礼时,可以恩荫;大臣致仕时,可以恩荫。如此,官员只有升迁,无有淘汰;且代代恩荫,比科举考试入仕更快,这也是宋代冗官之一因。

关于宋代的冗兵及其原因,可见本课“课文注释”8。

14. 宋代的积贫积弱

冗官、冗兵,即官员和军队人数的激增,给北宋政府的财政带来严重的影响。北宋官员的薪俸甚厚,尤其是高级官员,薪俸之高,前代所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制禄之厚”一条,说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以两府大臣宰相、枢密使为例,其每月俸钱达 30 万缗。这笔钱在当时可买到 100 多亩良田。除了月俸之外,官员还有春冬服、随从人员的衣粮餐钱等,又有茶酒厨料、辛蒿炭盐等费用。优厚的俸禄,吸引士人拥入仕途,官员人数不断增加,由此也就带来了朝廷财政支出的增加。据统计,宋仁宗时的官员人数就比宋真宗时增加一倍,于是开销也就增加了一倍。如郊祀之费,据北宋中期的曾巩估计,景德中为 600 万缗,

皇祐年间则为 1200 万缗。而从景德年间到皇祐年间的官员人数也正好增加一倍。

北宋养兵的开支也极大。宋代的士兵有口粮、月钱和衣服,数量都颇为可观。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每年需要开支 5 万缗,一名厢军每年需要开支 3 万缗。军队人数的增加,自然也带来养兵费用的增加。宋仁宗时蔡襄有个统计,说全部禁军、厢军每年开支达 4800 余万缗,占宋朝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张载、朱熹也曾推算过,说养兵之费占全部财政的十分之七八。

除了冗官、冗兵带来的巨大费用之外,还有大兴土木修建寺院的费用、用于道场斋醮的费用、用于皇室皇宫的开支,都是动辄以万计。北宋对外用兵屡屡不利,每每以“岁币”“岁赐”换取停战议和。对辽议和,宋每年输辽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对西夏议和,宋每年给西夏银 7.2 万两,绢 15.3 万匹,茶 3 万斤。冗官、冗兵以及各种靡费所造成的“冗费”,使得宋王朝的国库入不敷出。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每年财政亏空达 300 万缗以上,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积贫”局面。

与“积贫”相伴随的是“积弱”,它也是北宋王朝的一个明显特征。一方面,官僚机构的重床叠架和权限职责不明,以及文牍簿书的往来覆去,不仅虚耗了官员的精力,也使得统治效率低下。低能无效的政治体制,不仅不能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起到调节、改善的作用,相反促使矛盾发展和激化。对由此引发的各种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中央、地方各级官府往往都无力控制,无可奈何。所以,“积弱”的实际表现之一,就是王朝对内控制力量的削弱。另一方面,北宋兵员虽多,却腐败懒散,无战斗力。宋时行更戍法,士兵往返于道路,远至数千里,除了费用开销增加之外,士兵与将帅隔阂,作战难以协调。将不专兵,军队缺乏训练,军纪不严,致使兵士养成骄懒之积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武官员也参与商业经营,将校兵士往往无心操练。凡此种都都给对外战争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积弱”的实际表现之二,便是北宋王朝对辽、夏的军事战争始终处于劣势,乃至屡战屡败,只能屈辱妥协。

八、研究动态

宋朝的历史地位

两宋王朝,自赵匡胤建国开始,至南宋为蒙古人所灭,总共延续了 320 年。宋与辽、西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并存,就统一的疆域而言,远不及汉唐,甚至也比不上晋隋。但中国传统社会,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看待宋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这是中外学者颇为关注且分歧较大的一个课题。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等认为,唐宋之间,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的商品经济远比唐代发达,商品经济的极度繁荣,使社会性质发生了变革,宋代进入了资本主义,只是其后的明代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停滞了 1000 余年,但宋代的文化是近世的,与汉唐不同。美国学者施坚雅也认为,在 11 世纪的北宋,中国就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学者从政治上的变化来分析唐宋之间的差异。如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与前代的贵族社会不同,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这是因为宋代科举考试使大量平民、布衣通过科举而为官任职,不像以前门阀时代讲门第出身。

不少学者不同意上述判断,但也肯定唐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宋代统治阶级的当权者是官僚阶级、官僚地主,而不是以前的门阀集团、身份性地主。

他们的经营方式也不同,后者是“部曲佃客制”,人身依附关系较强;前者是租佃制,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其二,宋代农业、工商业、海外贸易都有极大的发展。宋代一直被说成是积贫积弱,其实,弱是说它抵御外来入侵无力,贫是说普通老百姓的贫。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规模,远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城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巨大的变化。海外贸易以及工商业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这些都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自宋代起,政治体制明显呈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趋势。以谏官为例,秦汉的谏官主要是针对皇帝的劝谏;而宋代的御史与谏官,只对宰相和官吏进行监督,逐渐成为君主专制和党争的工具。以相权而言,以前的相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集行政、军事、财政于一体,这与宋代情况也大不相同。至于中央职官制度,秦汉有三公,魏晋隋唐还有三省,至宋仅设一省,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小,中央集权越趋明显,至明代达到极端。其四,社会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达到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宋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仍属于传统社会的性质,只是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一个转折点,而不能被列入近代历史的范畴。宋代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由前期逐步进入后期的一个重要阶段。

九、参考书目

1.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陈振著:《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家驹著:《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虞云国著:《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 虞云国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
6. 程郁、张和声著:《话说中国·文采与悲怆的交响》(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